

梁启超与翻译

袁 锦 翔

梁启超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不少人对他进行过分分析、批判,但他同时是个有积极贡献的知名学者。因此有人曾把他评为“一个把伟大和渺小、光荣和耻辱结合一身的历史人物。”^①值得提出的是,他在翻译领域里还是一个颇有影响的翻译评论家与翻译史家。本文拟就这一方面略书几点初步的看法,就教于读者。

一

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二、三十年里,梁启超曾从事过一段翻译工作。1896年,他研究前二十余载国内译出的西书三百余种,编成有名的《西学书目表》,并写有《西学书目表序例》。同年,发表了重要论文《论译书》。1898年,他的《译印政治小说序》一文问世,在小说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戊戌政变失败后,他逃亡日本,办《新民丛报》,顽固坚持保皇立宪,与革命派对抗。但该报译介西方思想著述的文章,颇具影响。1902年,他在该报第十八期发表了《进化论革命者颌德之学说》一文,介绍英国进化论者颌德(Benjamin Kidd)的思想,曾写道:“今日德国有占势力之二大思想,一日麦喀士(按:即马克思)之社会主义,二日尼志埃之个人主义。”“麦喀士谓今日社会之弊,在多数之弱者少数之强者所压伏。”^②梁启超可说是迄今所知把马克思主义介绍到中国来的第一个中国人。

1920年,梁启超欧游回国后,系统地研究了佛经,围绕编著《中国佛教史》洋洋洒洒地写了约三十万言。其中比较重要的文章包括《佛教之初输入》、《翻译文学与佛典》、《佛典之翻译》等篇。1924年,他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在这些论著中,他对我国古、近代重要翻译家或评论家的翻译理论与技巧作了扼要的阐述,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梁氏在翻译实践方面只译过四种小说,且无成功之作。但他在所著小说《新中国未来记》(1902)中译出的长诗《哀希腊》的两节是我国最早出现的拜伦译诗。

二

在翻译评论与翻译史方面,梁启超也作了不少工作,并有他独特的贡献。

我国清末民初出现了几位著名的翻译家与评论家。如严复以翻译西方学术思想闻名全国,他提出的翻译标准“信、达、雅”更影响深远。林纾翻译了一百八十多种西方小说,也是个赫赫有名的翻译家。然而在翻译评论家当中,梁启超则是比较重要的一个。

首先,他把翻译事业与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并摆在十分重要的地位。

十九世纪下半叶,列强多次对我国发动侵略战争,中国政局十分严重。1894—1895年中日战争之后,中国更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其时有识之士纷纷出来提倡变法自强,维新运动蓬勃发展。梁启超则是走在运动最前列的一个。他在《论译书》^③一文中指出,中国要在国际上谋取生存,就必须“知己知彼”,西方各国的强盛,就是得益于“知己知彼”——即翻译事

业的发达的。他写道：

且论者亦知泰东西诸国，其盛强果何自耶。泰西格致性理之学，原于希腊；法律政治之学，原于罗马。欧洲诸国各以其国之今文，译希腊罗马之古籍；译成各书，立于学官，列于科目，举国习之，得以神明其法，而损益其制，故文明之效，极于今日。

他在总结了世界上一些强国由弱变强的经验后指出，中国必须效法西方，并须从翻译事业着手，而俄国与日本是两个成功的范例。“大彼得躬游列国，尽收其书，译为俄文，以教其民，俄强至今。”至于日本，也值效法。“今日本书会，凡西人致用之籍，靡不有译本。故其变法灼见本原，一发即中，遂成雄国。斯岂非其明效大验耶。”回头看看中国，“中国之效西法三十年矣”，却迄未成功！为了效法西方，他认为“中学”与“西学”“不能偏废”。西学之书不读，就不能效法西方；而翻译又是读西书的前提条件。因此，他坚信“译书实本原之本原”。而具体办法就是“其一使天下学子，自幼咸习西文，其二取西人有用之书，悉译成华字，斯二者不可缺一。”这样一来，“一书既出，尽天下之士，皆受其益。”

梁启超的“译书实本原之本原”的提法，根本不谈推翻满清反动统治的必受性，却把译书看成根本的任务，这完全是本末倒置，从而清楚地反映出他的改良主义的政治观点。但他为使中国摆脱民族危亡的逆境以及纠正当时社会上轻视翻译的风气，一再强调译书的重要性这一点却是可取的。事实也证明，他的努力确实产生了效果。

其次，他认为要把翻译搞上去，必须采取三大措施。“故今日而言译书，当首立三义，一曰，择当译之本；二曰，定公译之例；三曰，养能译之才。”

所谓“择当译之本”，就是慎选原本。他认为“官局旧译之书，兵学几居其半”，这就是选择不当，不可能学到人家的根本。“当知西人之所强者士，而所以强者不在兵。不师其所以强，而欲师其所强，是欲前而却行也。”因此，“兵学之书，虽毋译焉可也。”

在他看来，当译之书一是“西国各种之章程，类皆经数百年数百人数百事之阅历，而讲求损益，以渐进于美备者也。”二是西方“学堂定课之本”，即各级学校的教科书。教科书一经译出，教师就可免于“茫然未知所从”，“虽中才，也可胜教习之任。”三是西方的法律。“今日之计，莫急于改宪法，必尽取其国律、民律、商律、刑律等书，而广译之”，与此相关的“公法例案、条约集成等书，皆当速译。”然而他认为不可盲从西方的法律，翻译时必须联系本国实际，“斟酌损益之，通以历代变迁之所自，按以今日时势之可行，”才能收到实效。四是西方各国的史书，这包括君史、民史（如农业史、商业史、工艺史、矿史、交际史、理学史）。其余当译之书，还包括各国的蓝皮书、农书、矿书、工艺书、名理学、物理、化学、数学等。

但他指出，翻译以上各类书籍，要根据不同情况，妥善安排。“旧所已有者略之，旧所寡有者详之，”“先后缓急，亦当有次。”至如同一门类之书，则当于数书之中，择其佳者，或择其后出者……。”

梁启超关于选书的主张，不一定切合我国当今的需要。但他强调慎重选书，要译别国之“所以强”的经验，要分清“先后缓急”，译“佳者”、“后出者”，并要详略得当。这些建议对我们今日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所谓“定公译之例”，就是统一翻译名词术语。十九世纪末，我国翻译西书蔚然成风，但名词术语很不统一，译者读者均感不便。梁启超因而倡议从速统一名词术语。当时翻译家傅兰雅给某些词加上偏旁造成新的科技名词，梁启超认为“此法最善。”对于傅兰雅没有解决的人名、地名、官制等方面的术语，他也能提出自己的看法，如主张人名、地名根据北京音进行音译，以利全国通用。但先前已有译名的，则可“取通行最久人人共读之书，刺取其译名”，

不必另订等等。

所谓“养能译之才”，就是大力培养翻译人才。他认为译者应具备三项条件，此即精通原文语言与译文语言(所谓“通文”)，熟悉所译专业知识(所谓“通学”)。其中关于“通学”这一条件是前人很少注意到的。但他认为“三者之中，又以通学为主，而通文乃其次也。”他建议成立专门培养翻译人才的学堂(以区别于同文馆)，但他后来不得不承认，这种翻译学堂仍难以做到专业对口，不一定能培养出专门的科技翻译人员。

从上面两点可见，梁启超关于翻译是否急需、应当翻译何种书籍、译者应具备什么条件。以及如何厘定翻译名词等一系列问题，大都提出了比较实际、中肯的见解，因此《论译书》一文颇受时人重视。

在梁氏此文发表之前两年，晚清著名的语言学家、《马氏文通》的作者马建忠曾向清朝呈递著名的奏摺《拟设翻译书院议》提出了“善译”的原则，译者应具备的条件与成立翻译书院培养翻译人材等建议。梁氏与马氏的翻译主张有同有异，可谓互为补充，交相辉映。

第三，他主张使用比较通俗的语言去翻译外国著述。

梁启超在散文方面造诣颇深。他所创的“新文体”“务为平易畅达”，“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具一种魔力。”④这种文体“对一切传统古文是一次猛烈的冲击，为晚清的文体解放和‘五四’的白话文运动开辟了道路。”⑤

梁启超把他的“新文体”当作宣传改良主义的有效工具。因此在翻译方面，他认为翻译的目的是“播文明思想于国民”，理应使用“流畅锐达之笔”进行翻译，使“学童”也“受其益”。其时严复用“赅赅乎与先秦诸子相上下”的古雅难懂的文体去翻译《天演论》、《原富》等世界学术名著，梁启超就此向严复提出批评，建议他的翻译改用通俗的语体：

严氏于中学西学，皆为我国第一流人物，此书(指《原富》)复经数年之心力，屡易其稿，然后出世，其精美更何待言。吾辈所犹有憾者，其文章太务渊雅，刻意摹仿先秦文体，非多读古书之人，一翻殆难索解。夫文界之宜革命久矣。欧、美、日本诸国文体之变化，常与其文明程度成正比例。……况此等学理邃颐之书，非也流畅锐达之笔行之，安能使学童受其益乎？著译之业，将以播文明思想于国民也，非为藏山不朽之名誉也⑥。

梁启超不赞成用渊雅的先秦文体进行翻译，他是把翻译文体与所谓“文界革命”(即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文学运动)联系起来考虑的。只就翻译文体而言，他的批评无疑是正确的。可惜严复仍固步自封，不仅未虚心接受梁氏的批评，反而辩解说道：“若徒为近俗之辞，以便市井乡僻之不学，此于文界，乃所谓陵迟，非革命矣。”又说：“不佞之所从事者，学理邃颐之书也，非以饷学童而望其益也，吾译正以待中国多读古书之人。”⑦

由于严复固执己见，他所译的几本名著大都艰深难懂。因此，虽然他在西方资产阶级学术造诣上远非梁启超所能比拟，但他对广大国民的实际影响却未能达到应有的程度。其后，梁氏所提倡的比较通俗的翻译语体日益发展，而严复所坚持使用的古雅译体却走进了死胡同。两相比较，证明了梁启超在这个问题上还是有远见卓识的。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他集中了当时一些资产阶级改良派政治家和思想家的见解，大力倡导翻译政治小说，且影响所至，开创了我国文学翻译的兴盛时期。

中国以前的封建文人轻视小说，把小说看作“雕虫小技，壮夫不为。”经史子集里，根本没有小说的地位。至于西方小说的翻译，在戊戌维新之前更是问津者寡，译者甚至往往不敢署上真实姓名。

梁启超却充分估价小说的社会作用。他和严复等人把翻译小说和哲理著作看成“启发民

智”乃至改良政治的有效工具，一再呼吁提高小说的社会地位。

1898年戊戌维新前后，社会上出现的译作犹如雨后春笋。但其时应该主要翻译何种著作，一般人却不甚清楚。梁启超此时便发表《译印政治小说序》，鼓吹翻译政治小说：

在昔欧洲各国变更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于是彼中辍学之子，赏塾之暇，手之口之。下而兵丁，而市伶，而商氓，而工匠，而车夫马卒，而妇女，而童孺，靡不手之口之。往往每一书出，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⑧

因此，他主张“采外国名儒所撰述、而有关切于中国时局者，次第译之。”他本人也动手翻译《佳人奇遇》等几部外国小说。

后来，他在1902年发表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进一步发挥了这一观点：

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⑨

在这里，梁启超明确地提出了他的政治小说推动社会进步的改良主义观点。

他的小说理论发表后，受到了社会舆论的重视，翻译界开始出现一些重大的变化。歧视翻译小说的观念逐渐转变。翻译政治小说、乃至科学小说和教育小说之风大盛。例如林纾在他的外女译作《巴黎茶花女遗事》取得巨大成功之后，在翻译小说受到社会欢迎的新形势下，又译出名著《黑奴吁天录》(Uncle Tom's Cabin)(1901)。此书一经出版，就激起了中国人民对当时美国政府迫害旅美华工的声讨。林氏后来又译出了狄更斯写的一些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如《孝女耐儿传》(1907)、《块肉余生述》(1908)、《贼史》(1908)等，也在广大读者中产生了良好的反响。当时曾有人估计，1907年印行的小说中，翻译小说占总数的百分之八、九十。⑩顺便提一下，梁氏关于小说的理论对晚清创作小说的繁荣与发展也起过积极的作用。如《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谴责小说与《新小说》、《月月小说》、《小说月报》等刊物相继问世。据阿英估计，晚清“印成单行本的小说，至少在二千种以上。”⑪小说的社会地位果然得到了空前的提高，并形成了一个规模较大的小说改良运动，冲击着封建文人轻视小说的传统观念，引进了西方的文学成果。固然，促成这一繁荣局面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不能夸大梁氏的贡献，但从中也可以看出，梁启超的译印小说的理论在当时是有着一定的进步意义的。

然而，还必须同时指出，梁氏的小说理论也产生了十分有害的影响。他在《译印政治小说序》一文中盲目崇拜外国、大肆宣扬外国小说的积极作用的同时，却把包括《水浒传》、《红楼梦》在内的我国小说一概诬蔑为“不出海盗海淫两端”，影响至为恶劣。《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则无限夸大了小说的作用，错摆了小说与政治的关系，给人的印象是，小说能决定一切。其实质是把政治腐败归咎于旧小说，将国家危亡归罪于人民，从而开脱了满清统治者的罪责，模糊了人民的斗争方向。它所起的作用是消极的、反动的。⑫

此外，梁启超在强调小说的思想性时却忽略了艺术性，也造成了一定的消极影响。他自己创作的小说如《新中国未来记》艺术上相当粗糙，书中主人公无血无肉、苍白无力，只是梁氏的改良主义思想的传声筒。⑬他的翻译小说《十五小豪杰》(1902)等也使读者感到“沉闷乏味”。⑭清末民初小说艺术性普遍不强，这和他的影响不无关系。

三

梁启超对我国的佛经翻译史与明清之间的科技翻译也都进行过一番研究和探索。

在我国历史上,外国文化与思想大规模输入前后共有三次:第一次是东汉至宋元之间印度佛教的传入;第二次是明清两代西欧科技的引进;第三次是十九、二十世纪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其中佛教传入后在中土生根,全靠佛经的翻译。

我国有书可查的翻译实始于佛经的翻译。佛经的翻译持续甚久,影响很大,在中国翻译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但近数百年来专门研究佛经翻译史者为数甚少。

梁启超笃信佛教,他是我国近代研究佛经翻译史较早的一人。他的研究成果有三个方面值得一书:

其一,他经过细心的考证,揭竿而起,批判“汉明永平求法”的传说,指出《四十二章经》是晋人伪托的,提出了佛经的翻译始于汉桓、灵帝间的推断,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我国佛经的翻译始于何时,史家们是有争议的。

梁启超以前的佛学家,大都承继前人的说法,认定佛经的翻译始于汉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即天竺僧摄摩腾来中国译《四十二章经》,并藏于洛阳白马寺石室之时。然而,梁启超却旁征博引,写出《佛教之传入》一文及其两个附录《汉明求法说辨伪》与《四十二章经辨伪》,发前人所未发,批驳了这种说法。他写道:“汉明之永平求法说,大略谓明帝感梦金人,遣使西域,斋还经像,创立寺宇,今藏中《四十二章经》,即当时所译。……虽然,试稍用严正的史识一绳之,则兹事乃支离不可究诘。”他的第一个论据是:“盖当时西域交通正中绝,使节往返,为事实上不可能。即兹一端,则此段史迹,已根本不能成立。”第二个论据是:“其所宗据之《四十二章经》,察其文体,案诸经录,皆可断为两晋间人作,绝非汉时所有。”第三个论据是:“至于各书关于兹事所记载,其年月、其所遣之人、所历之地、所作之事,无一从同,而矛盾罅漏随处发现。”因此他的结论是:“……以吾之武断,直谓汉明求法事,全属虚构。”以吾所推断,则我国译经事业,实始于汉桓、灵间(西第二世纪中叶)。”^⑬如果梁启超的推断是正确的,则我国翻译史当最早始于公元147年(桓帝元年),比过去公认的公元67年推迟至少八十年。

梁启超提出这一推断后,学者意见纷歧,大体分为三种。一种意见同意梁的推断,认为佛经的翻译最早始于汉桓、灵间。持这种意见的有蒋维乔、翦伯赞、张培基等,美籍学人Kenneth Chen以及日本当代大多数佛学家也都赞成这一主张。另一种认为原先的说法还不能率尔推倒,可以汤用彤、周谷城、钱歌川、张振玉等为其代表。第三种观点是,这问题还不能遽下结论,宜付诸阙疑。唐长孺似倾向于这一看法。笔者也认为,佛经经文多已散佚,很难找到充足的证据求得结论,这一争论恐要继续下去。要之,这一重大争论是由梁启超肇其端的。

其二,他比较细致地划分了佛经翻译的三个时期,并评价了每个时期的主要译家与评论家及其在翻译理论与实践上的贡献。

在中国翻译史上,梁启超第一个比较详细地分析了佛经翻译的三个时期:第一期,外国人主译(自东汉至西晋),主要译家有安清、支谶、支谦、竺法护等;第二期:中外人共译。其中又可分前后期。前期包括东汉、二秦,主要译家有鸠摩罗什、佛驮跋陀罗等,而道安与慧远则是组织翻译的元勋,后期自刘宋元魏至隋,译家有真谛等;第三期:本国人译,自唐贞观至贞元。此为佛教翻译的全盛时期,而玄奘是主要的翻译大师。其后则有义净、不空等。

宋元间虽也译佛经，但译品已微不足道；在他看来，不必另立一个时期。梁启超提出的分期法虽非定论，但对后来的佛经翻译研究者是颇有启发的。

不仅如此，他还对几个时期中的重要译家与翻译评论家逐一加以评论，指出各人的翻译特点与贡献。如谈到道安时，称赞他的“五失本、三不易”论，高度评价他在改变东晋的翻译文体上所作的贡献。“翻译文体之创设，安公最有功焉。”谈到鸠摩罗什，则称颂他重视保持原作的文体，是“秦梵两娴，诵写自在，信而后达，达而后雅”的翻译大师。评论彦琮时，则赞评他的《辩证论》，尤其是其中的“八备”说，既谈到“译才”，也论及“译德”，“可谓名论”。关于玄奘，梁启超誉为翻译佛经的“空前绝后之伟大”。总的说来，这些评语是符合实际的。

其三，他深入地研究了译经的文体，从直译与意译的对抗去分析评论东汉至唐六百年间的翻译名家，立论公允，描述生动。因此这部分写得比较精彩，成为后人研究我国古代直译意译之争的重要参考资料。

梁启超认为佛经的翻译应忠实审慎。“译家之大患，莫过于属杂主观的理想，潜易原著之精神。”^{①6}但就文体而言，则从佛经翻译之始，便出现了直译与意译两派。他在《翻译文体之讨论》^{①7}一节中，引经据典。把安世高、支娄迦谶、竺佛朗、支曜康巨等人列为直译家；而支谦、竺法护等则归于意译派。他详细分析了道安的文体主张，认为“究其旨趣，殆归直译矣。”关于鸠摩罗什，他写道：“凡什公所译，对于原本，或增或削，务在达旨，”是“译界第一流宗匠。”罗什“偏重意译。”

在他看来，慧远持折衷调和之论，“亦两派对抗后时代之要求也”。他认为彦琮主张“宁贵朴而近理，不贵巧而背源”，似是直译论者。他对玄奘推崇备至，写道：“玄奘者，则意译直译，圆满调和，斯道之极轨也。”

对直译意译之争，他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平心论之，完全直译，因彼我文体悬隔太甚，必至难于索解。善参意译，乃称良工。”似乎也是调和论。

总而言之，梁启超在佛经翻译史方面所作的深入研究为我们研究祖国的古代翻译奥下了重要的基石，功不可没。

梁启超除对佛经翻译史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外，还早在十九世纪末便已对明清之间、尤其是清末的科技翻译作过一定的探讨。

前面已提到，他在1896年编就《西学书目表》，此表包括了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同文馆与江南制造局成立后所译及教会人士所译述的作品。诸宗元等对它颇有好评，曾谓：“新会梁氏著《西学书目表》及《读西书法》，学者方有门径。”^{①8}

他在此书目表里把译书大致分为学（西学）、政（西政）、教（宗教）三类。他认为西政类译书寥寥可数，是不正常的现象；而中国官局所译书以兵学类最多，是没有学到别国的根本，这一批评是不无道理的。

他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1924）^{①9}中，扼要介绍了明末清初传教士译家的来龙去脉，以及明末以后三百年间译事的大端，并评介了此时期几个主要译家及其主要译述。他盛赞利玛窦与徐光启合译的《几何原本》为“字字精金玉，为千古不朽之作。”^{②0}对晚清著名科技译家（英）傅兰雅的名词翻译也甚为钦佩（见前）。关于严复的三项翻译标准：“信、达、雅”，他也有过评语：“译事之难久矣。近人严复标信、达、雅三义，可谓知言。然兼之实难。语其体要，则惟先信然后求达，先达然后求雅。”^{②1}在他看来，信、达、雅三项标准不应并重，而应有主有次，“信”应居于首位。

综上所述，梁启超在翻译领域里是作出了一定的贡献的。虽然他的论述往往打上了很深

的改良主义或唯心主义的烙印，其中有些还产生过有害的影响，他的研究成就距离人们的期望也还很远，但他仍不失为我国近代起过比较重要作用的翻译评论家与翻译史家。人们不但可以从他的论述中汲取一些有用的知识，而且也可批判地借鉴他研究翻译历史与现况的某些方法，以促进我国翻译理论与翻译史的研究。

注 释：

- ① 孟祥才：《梁启超传》，第422页。
- ② 萧超然：《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83年第一期。
- ③ 《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一集。
- ④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1932年，第142页。
- ⑤ 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四，第343页。
- ⑥ 《新民丛报》，第一期。
- ⑦ 《新民丛报》，第七期。
- ⑧ 《清议报》，第一册，1898年。
- ⑨ 《新小说》，第一卷第一期。
- ⑩ 据觉我：《余之小说观》，《小说林》第九期、十期。
- ⑪ 《阿英文集》，905页。
- ⑫ 参考立兴：《梁启超的小说理论与“小说界革命”》，《南京大学学报》（人文），1963年，第3—4期。
- ⑬ 参见孟祥才：《梁启超传》，第383页。
- ⑭ 钱钟书：《林纾的翻译》，第22页。
- ⑮ 以上引自梁启超：《中国佛教史》。
- ⑯⑰ 《翻译文学与佛典》，《饮冰室合集·专集》，第十四册。
- ⑱ 诸宗元、顾燮光：《译书经眼录序例》。
- ⑲ 《饮冰室合集·专集》，第十七册。
- ⑳ 梁启超：《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8—9页。
- ㉑ 《佛典之翻译》，《饮冰室合集·专集》，第十四册。

（上接第96页）而合理预期学派又是现代货币主义的分支，必须紧接现代货币主义之后。

更值得注意的是，本书还力图以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说中“国家干预”和“自由经营”两大思潮的兴衰交替为主线来安排结构体系。本书在流派安排上大体可分三个部分。首先是以凯恩斯主义为代表的以“国家干预”思潮为主的经济学流派。然后是与之对立而起的现代货币主义、全理预期学派、供给学派等以“自由经营”思潮为主的经济学流派。而其他流派，诸如熊彼特的“创新理论”，美国激进经济学等较为独立的学派则安排在最后。这样安排，使当代西方经济学说的主要发展演变过程显得主干分明，重点突出。

本书是介评当代西方经济学说的高水平著作，但也有美中不足之处，需要进一步完善。有的文字稍欠精练，有的译名不统一，有的概念内涵不一致，有的章节有些繁琐，有的地方在体例上还存在着论文集和讲稿的遗痕。一些技术上的错误对阅读也有影响。另外，我们建议，本书再版时是否还应增补瑞典学派、哈耶克自由主义和罗斯托经济成长阶段论等流派思潮，是否可以附上人名译名和参考文献索引。